

书评

一代人 理应有一代人的创造



《帝国的终结》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
易中天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1月出版

◎胡飞雪

帝国制度被辛亥革命推翻已近百年,但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却是步履蹒跚。要回答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如此充满曲折反复这个问题,需要用现代化的眼光来解读、审视中国的帝国制度和帝国历史。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结果。

在这本《帝国的终结》中,易中天站在古今中外的纵横坐标上,兼容并包诸子百家的精辟史论思想,尤其是他站在现代民主、现代宪政和现代共和思想和制度的前沿,用现代思想解析历史问题。有些疾病,古人也患,比如今人共知的糖尿病,古人曾叫做“消渴症”,对这种病,古人虽也认识到是一种病,但对其发病机理,并不知其所以然。对中国2000余年的帝制也是这样,古人早已认识到它有病,但也仅仅是认识到了它是疑难杂症,而究竟如何来治疗,则几乎无人能开出药方。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就是治乱循环、兴衰演变,就是不断改朝换代、轮流坐庄,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清人黄宗羲谓之“周而复始”,今人谓之“超稳定结构”。帝国制度的这个特点,易中天曾多次论及。

帝国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官僚集团,在帝国历史上,官僚团伙其实也是载舟之水,也是覆舟,帝国制度成败皆在于它,而说到官僚团伙对帝国制度的颠覆,易中天认为,官僚集团的自我膨胀以及追求代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官僚集团无可救药的主要原因:“历代王朝的精兵简政没有一次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里……帝国不得不依仗的官僚集团,就这样成了它的掘墓人。成也官僚败也官僚,这也许就是帝国的宿命?”官僚集团上下其手既骗朝廷,也骗基层地方,之所以得逞,源于社会各权利主体的权力、责任和义务事实上的不平等、不清晰、不明确,也源于社会各利益主体在拥有知识、信息和资源上的不均衡、不平等、不完整,人的主观原因和物的客观原因混合其间。

从帝国制度在秦始皇手中诞生起,“百代都行秦政治”,但具体的政治操作一直处于变化、演进、调整之中,后人,尤其是当权作主的统治阶层也从未忘记过以史为鉴,不断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比如西汉认识到暴秦恶政的危害而施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国策;唐继承并完善、发展隋开创的科举制度;唐纵容军人,酿成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宋则矫枉过正,崇文抑武,对将领严防死守,又造成军队缺乏效率,最终亡于金、蒙;明亡于宦官之祸、官僚竞争、自然灾害、民族矛盾、官民矛盾等,清在这几个方面,显然要好得多,笔者的答案是,清帝国以及帝国制度亡于全球化浪潮。

在分析清帝国以及帝国制度消亡的原因时,不能局限于“宏观叙事”,见物不见人,归罪于帝国制度的原罪,因为这样说容易失偏于空疏,最好还是通过微观叙事,分析具体的人,从具体当事人身上找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推动历史运动的是人民,但某些个人会发挥关键的作用。一个蛤蟆四两力,一些很平凡很弱势的人(如丐帮)有时也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但不能否认,在权力顶层当家作主的人,往往发挥决定性、全局性的作用。近些年来,大多数史家公认,世界范围内的近代化进程始于十六世纪,而中国之所以在五百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处于落后被动状态,原因或者说责任正可以

追溯、追查到明、清两朝的皇帝头上。有明一代,海禁是基本国策,官府不允许沿海居民与外商通商贸易。清承明制,虽有放松,但也好不到那里去。中国之融入世界体系地球村,是英国坚船利炮威逼的结果。得到这个结果,包括统治集团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被动的,很不情愿的,万般无奈的。这样主流的国民心态,决定了帝国制度的终结,也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充满坎坷。

本书可圈可点的真知灼见纷呈密集,但也偶见一些奇谈怪论,笔者实难苟同。比如《民主与宪政》一节:“不过,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如立宪派)或某个团体(如清王室)的失误,而仍应归结为‘限政传统’的阙如。”这种历史决定论大可商榷。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更是具体的人创造的。古人没有创造宪政,决不是后人创造宪政的理由,如果古人没有创造,后人就不创造,那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不客气地说,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正是某些个人或某些团体的错误造成的。慈禧太后死前对她侄女隆裕太后说国家没有在她手中亡掉,不是由于无知,就是想掩饰罪恶,推脱责任。无知是政治人物的通病,推脱责任是他们的行为习惯。帝国制度由秦始皇创建,如果“传统阙如论”可以说得通,那么秦始皇完全可以不推行以郡县制为主要内容的帝国制度,甚或可以进一步说,秦始皇以前的分封制也不会被周公创造出来。

后人干什么,是不能取决于前人干没干过的。2005年10月施行的新公司法引入了“公司法人否认”或称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是很有道理的。公司董事长有权有利(年薪几十万司空见惯,愈百万、千万人不鲜见),出了问题把责任推到“公司集体董事会”身上,这没道理,更不公平,所以必须揭掉他们掩人耳目的面纱,把责任落实到个人头上。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之功罪是非,也应算个人帐。慈禧太后无才、无德、无知、无能,昧于世界形势,却乾纲独断,她在晚清朝廷大权独揽47年,自定的月(或说日)伙食标准支出是2万两大洋(易先生说清皇室年开支不过三万两,恐怕是轻信了清廷统计局的误导性陈述或清宣统机构的信口开河),修建陵墓加陪葬品愈5000万两白银,浪费民脂民膏社会财富之巨大空前绝后。说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不是因为她的无知和顽梗,实在是双锤擂鼓不通不通。

历史是由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创造出来的,功罪是非皆归于人,如果要追究责任,只能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古人当然不能为后人负责,后人更不能依靠传统混日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任务使命,谁都逃不掉。一代人也应有一代人的创造,如果不能顺应时代要求,该创造而不创造,把绝承担历史责任,就是无功于当代,有愧于后世。



《出轨》
——娃哈哈与达能的中国式离婚
刘华 左志坚 合著
中信出版社 2008年2月出版

◎郑作时

记录当下的商业历史,最大难度就在于所涉及的都是利益中人。当利益足够大时,这种记录就有相当的风险。我以为,这本《出轨》的可看之处,就在于它忠实地记录了一切关于娃哈哈与达能集团之争事件的前前后后,既有娃哈哈和宗庆后方面的正确与错误,也有达能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正面与负面。两位作者在坚守不做任何价值判断前提下,完整而毫不保留地把事实记录下来一清二楚。因此,《出轨》



发展的天空其实非常高远

——关于《江苏脉动》

◎俞建施

开始关注《江苏脉动》书中收录的文章,还是在2003年。那时统领这些文章的一级标题还叫“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是南京大学小百合BBS上的原创热文。那时还在南大读书的我,也很爱逛百合、看文章、发帖子,也会一时意气参与一些热门话题的争论,但事后想想,参与这些网络讨论,虽然图得个唇枪舌剑的痛快,但对于自己知识积累并不见得有什么帮助。所以,对于网络,时常有种“鸡肋”之感。不过,在朋友的热心推荐下拜读“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的系列文章后,心里着实有些震撼,上述的困惑之感也大大消减。原来BBS上也可以讨论地区研究发展这样的严肃议题,而这样的严肃议题也可以用唯美的文字来表达。读贴的收获自不必言,分歧也存在,所以起了开贴争论的念头,然而终究只是念头,我大概是永远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经济小品文的。所以,当今天有这样的“一本日积月累的书摆在我的案头时,心中既有敬佩,也自觉惭愧。

从全球范围看,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概念的形成,顶多只有200年时间。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发展”便被等同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被进一步缩小为“GDP增长”,这种视界窄化的后果之一,便是发展手段的越来越简单化。君不见,发展常

常被简化成为劳动力、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投入的一个自动过程。日益“科学化”的经济学,也终于被公式、符号、统计推断所充斥,理论沉湎于自身的优美逻辑中不能自拔,经济学家们庖丁解牛般把世界条分缕析,却又不自觉中做了工具的奴隶,在割裂的世界里团团乱转。

出路在哪里?当然还是回到人本身。当发展的目的不再执迷于身外的物,而专注于人的选择空间和实际机会时;当人不仅被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当发展的投入不局限于人所创造的和使用过的实物,而且还包括人所创造的传统、习俗、制度以及历史记忆时,我们会发现,发展的天空,其实非常高远。

有些人开始转换脑筋了,但还不多。这本《江苏脉动》,不是一本经济学意义上讨论经济发展的书,尽管书中不乏经济学意义上的讨论,但这正是它在讨论区域发展的浩瀚文献中显得特别的地方。在我看来,这些文字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这样的三点:一是历史主义视角的运用,对传统的关注提供了超出截面分析所能容纳的内涵;二是对人这一发展主体的能动性予以充分的尊重,使得历史传承之外的突变有了更合理的解释;三是努力使政治、经济、文化、人文情感等关联因素在发展研究中融合,这使得



《江苏脉动》
网络时代的区域新观察
龚海泽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狭隘经济分析造成的割裂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得到了统一。虽然,不是所有的篇章都体现出了这几方面,即使有所体现的也未必就体现得充分,体现充分的也未必就见得合理,但是作为一个初步的尝试,能够给读者提供超出狭隘经济分析的启迪,其意义就弥足珍贵了。

由此观之,本书的最大不足与其说是在分析技术上,倒不如说是对发展目标本身的理解上。如果发展是着眼于人的选择空间的扩展,而非仅仅是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如果发展的赋权性、公平性、持续性和生产性能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那么本书中历史性、主体性和综合性的分析视角与分析对象之间就会更加相得益彰,关于苏鲁、苏南苏北、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也会显示出更大的借鉴意义。

当规则遇上人心

一书,就像一尊雕塑一样,凝固了一段历史。你可以说这尊雕塑中的那个人有缺陷或者不漂亮,但你觉得承认,越是记录得真实,雕塑本身就越越好。

被称为“达娃事件”的这场商业纷争,是一个中国现代商业史上的标杆。从公司角度来看,它是一个中国公司和一个跨国公司的较量;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强悍和有力量中国企业家和几个高级经理人及一个法国企业家之间的较量;而从根本上说,这是规则与人心、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较量。这个至今尚不知结局的事件是如此具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它成为中国商业史上几乎是值得记录的事件。现在,一个商业事件还在发生的过程中,关于这个事件的书,已经在市面上流通了,这又不禁让人感叹中国向商业社会进化的速度真是越来越快了。

无论是娃哈哈还是达能,都是商业上的强者。作为一个经营实业的商人,宗庆后卓尔不群,在大批中国企业冲击饮料、保健营养市场难逃昙花一现结局的背景下,他从无到有,运用一切手段凭空造出一个最为优秀的中国企业,可以说得

到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极致。从《出轨》一书对宗庆后的种种细节描述中可以看出,宗的底气 and 霸气实在了得。他在商业上是一个规则的制订者,他对手段和人心的运用,达到了娴熟而游刃有余的程度;你可以说他不在乎规则,正是因为对大量规则和潜规则的运用和冲破,才使他有今天的成就。

问题是霸王遇上了另一个霸王。达能同样是一个霸王,一个在技术、资源和手段上运用也极为娴熟的跨国公司中的一群聪明人。他们近十年间在中国饮料市场屡有斩获,凭借着资本、品牌、政府关系和国际商业游戏规则,试图来制约在娃哈哈这一中国品牌中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宗庆后,进而达到让宗为其谋取商业利益的根本目的。这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达能的根本目的是让宗庆后为其服务并交出商业利益,而宗庆后则凭借着其在一个企业内的人心和资源的绝对控制力和一流的经营能力,与达能对抗从而达到经营者对资本的控制。对于双方的核心目的来说,一且对抗,都是两难。

凭借《出轨》对于此案例的跟

踪、记录,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现实中的两难问题将如何得到解决。在这个现实之中,宗庆后已经两次辞职,而且让他交出商业利益他也不在乎,关键问题是达能能让一个强势而在中国企业生存的土壤中游刃有余的宗庆后继续为其服务吗?如果不能,达能在乐百氏的经营中已经表明他们是本土市场的强者,达能就算得到了娃哈哈,恐怕也是个空壳公司而已。

但是达能的中国本土最高掌门人范易谋那个明显而露骨的威胁也是有效的。他明确地表示,如果宗庆后真正离去,达能将让宗在诉讼中度过余生。我们且不论宗庆后与达能之间形成纷争的原因除了商业利益外还是哪些错综复杂的因子,单是范易谋这个几乎完全超越商业利益而涉及个人事务的威胁,就足够能看出国际商业资本为了利益而不惜一切手段的面目。我们不清楚范易谋此言何出,但就宗庆后而言,作为一个人,他没有必要因商业利益而超越法律。再看达能,因为商业利益而不惜置对手于死地,这种做法也令人不屑。

■新书过眼

《黄金屋》

对冲基金顶尖交易者如何从全球市场获利

局外人一般总很喜欢谈论对冲基金,但真正执掌对冲基金的人却常常对此讳莫如深。卓布尼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全球顾问公司的发起人和合伙人,这家机构专门从事全球宏观经济调查和咨询,客户为全球领先的对冲基金公司,这使他有足够的实力和人脉资源去撬开全球顶尖的13位对冲基金从业者的嘴。尽管卓布尼的初衷是围绕全球宏观对冲基金来谈,但他们的谈话内容却更深入、更广泛,包括了很多投资内容和经验,涉及投资风格和原则、风险、资产配置、历史、政治、央行政策、全球化、交易、竞争、聘用、对冲基金的改革等。卓布尼试图通过记录这场悄然进行的金融革命及其背后的思想,来解释这些证券投资业最聪明的大脑何以能够从纽约、伦敦的一间间斗室中赚取难以计数的巨额财富。



(美)史蒂文·卓布尼 著
马杰 石晓军 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B2B 品牌管理》

企业之间经济往来全球化与国家界限淡化,已是21世纪商业领袖们的共识,而品牌则已成了我们这个星球所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利普·科特勒是当今世界市场营销学的权威之一,是《营销学原理》和《营销学导论》的主要作者,本书是他和B2B品牌管理专家弗沃德教授的最新力作,深入探讨B2B产品品牌化的艺术和科学,不仅提供概念和理论,而且还分析了B2B产品成功品牌化的大量案例。品牌化始终是诸如可口可乐、麦当劳、柯达和梅塞德斯等著名B2C企业的关键成功要素,现在,越来越多的B2B企业开始采用全方位品牌化战略,卡特彼勒、杜邦、西门子、通用电气等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科特勒特别提醒,B2B企业需要明白,品牌化的要害是关于市场供给物将创造和传播特定水平的性能和服务的承诺,而品牌背后的承诺推动着企业及其伙伴的行为。



(美)菲利普·科特勒
(德)弗沃德 著
楼尊译
格致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

正在术后康复中的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0月宣布隐退,给他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经历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此时翻阅这本传记便成了很有兴趣的事。这本传记是卡斯特罗2003年初至2005年间与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著名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100小时访谈的记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卡翁生平和革命斗争,从童年到参与学生运动和古巴革命;第二部分讲述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切·格瓦拉之死,苏联解体,古巴与非洲、美国、西班牙和拉美国家以及和中国的外交关系;第三部分阐述新时期的古巴,主要是古巴社会主义与全球化和今天的古巴。看卡翁对切·格瓦拉、纳尔逊·曼德拉、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还有毛泽东、邓小平、戴高乐等20世纪风云人物的,似能一窥其内心最隐秘的一角。



(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
(法)伊格纳西奥·拉莫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

《风水应该这样看》

在国学渐渐在主流意识形态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后,检视前人的文化贡献成了出版部门的一个热点,这当中就有了陕西人民出版社的6本《洪丕谟精品集》,本书即为其中之一。风水术,曾长期被认为是封建糟粕,“禁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逐渐突破。据洪先生解读,风水术实际上是集地质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为了适应人们普遍的避凶就吉的心态,风水师们曾编造了越来越庞杂的谎言笼罩其上,使原本具有朴素科学原理的东西成了神秘莫测的骗局。为恢复其原来意义上古代环境工程的面貌,今人的任务就是要对其清理。洪先生已经做出了他的贡献,更上层楼有待后来者。



洪丕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